



《汉书·艺文志》
辑论



尹海江◎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



《汉书·艺文志》辑论



尹海江◎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书·艺文志》辑论 / 尹海江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643-1148-3

I. ①汉… II. ①尹… III. ①古籍—图书目录—中国—西汉时代②汉书艺文志—研究 IV. ①Z81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1886 号

《汉书·艺文志》辑论

尹海江 著

责任编辑	杨岳峰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3.25
字 数	39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148-3
定 价	3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一

自河间献王刘德，至向、歆父子，我国传统文献学趋向成熟。他们的著述，大多散佚；他们的心血，储存在《汉书·艺文志》中。《汉书·艺文志》的文献价值，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五百九十六家，区分为六略三十八种(类)。六略者，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基于汉代诗赋创作繁荣、总量庞大之事实，将诗赋从“六艺略·诗类”析出，设置“诗赋略”(后发展演变为集部)，可谓创新之举。同理，东汉三国以后，史书量增，《国语》《国策》《太史公书》等遂从“六艺略·春秋类”析出，设置史部(初称丙部)。相反，子学衰变，份额锐减，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略，分分合合，终归于子部(初称乙部)。这就是从三国魏秘书郎郑默(郑众四世孙)“始制《中经》(甲、乙、丙、丁)”，至东晋著作郎李充的《晋元帝书目》完成(易其子、史之序：子入丙部，史入乙部)，经《隋书·经籍志》基本定型(经、史、子、集)，至今承用的古籍四部分类法。回溯其形成过程，不难看出，“六略”实为“四部”之根基。从六略三十八种(类)，到四部四十三类(《四库全书总目》)，历一千七百余年，我们固然可以从表层论列目录学分类之传承发展，更应该从内涵上感悟中国文化的早熟，共同且稳健运行的文化传统，凝聚力之强，推动力之大，是其他力量所难以比拟的。

《汉书·艺文志》的六略大序、三十八类小序，源自《辑略》，向、歆父子亦有所承继，渊源有自。可以这样说，六篇大序，连同小序，乃数代文献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经典作品。我们拿它跟《四库全书总目》的四部总叙、四十三类小序对读，可略窥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其理论意义，历久弥新。请以儒家类小序为例：“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

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也。”这篇小序，阐述儒家学说的根源和现状，既“于道最为高”，又遭遇“辟儒之患”。潜伏在儒家队伍中的邪僻不正之人，随意解释经典，为私心、野心张目，直闹得“五经乖析，儒学浸衰”。《庄子·胠篋》写窃得“仁义”解释权的大盗诸侯，为所欲为，没人拦得住，庄子师徒很无奈，想追究圣人的连带责任，那可不是文献学家的本职工作了。《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小序疾呼：“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则庶几孔孟之正传矣！”于“辟儒之患”，高度警惕，庄子们只管自己“逍遥”吧！

尹海江博士研读《汉书·艺文志》已逾十年。他的博士论文《〈汉书·艺文志〉研究——以〈六艺略〉为中心》，得到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认可，勉励有加。经数年修订，《〈汉书·艺文志〉辑论》即将刊版问世。春节前，海江来电话，嘱为作序。寒假清闲，略缀数语，希望海江继续发力，《汉书·艺文志》的学问大着呢！

辛卯正月元宵节 崔富章

写于浙江大学古籍所

序 二

清人金榜云：“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十七史商榷》卷22引清人姚振宗（1842—1906）《汉书艺文志条理叙例》云：“今欲求周秦学术之源流，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焉。”章学诚（1738—1801）《校雠通义序》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今人张舜徽的《汉书艺文志通释序》云：“《汉书·艺文志》为书短简，尤治学之纲领，群书之要删。”是均为知言，而《汉书·艺文志》之重要，于斯可见一斑。他如《汉书·扬雄传·赞》有“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之说，而《汉书·艺文志》将“扬雄赋十二篇”置于“陆贾赋”类中，非与“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一起著录在“屈原赋”类里；“屈原赋”类中的“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孟坚注“与王褒同时也”，而后序此为“阳成侯刘德赋九篇”“刘向赋三十三篇”“王褒赋十六篇”，等等。是亦甚启人之思。至于阮孝绪《七录序》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与“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云云，则似未达一间。在笔者看来，“诗赋略”之设，除了前汉这两体创作繁荣而数量剧增外，更重要的当是此“诗”非彼“诗”，“赋”虽为“古诗之流”“抑亦《雅》《颂》之亚”，然毕竟非“古诗”（《雅》《颂》），况且，“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而《国语》《世本》《太史公书》等之入“六艺略·春秋类”，除了“史书甚寡”外，恐更在于《国语》《世本》《太史公书》等史书本为之“子孙”——其实，《春秋》是“经”亦是“史”，就后者言，《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太史公自序》中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读此而能以古还古，则思过半矣。

正因为《汉书·艺文志》重要，南宋时便有王应麟（1223—1296）《汉艺文志考证》这样的研究专著。其后，尤其是晚清以还，可谓名家辈出。如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与《汉书艺文志条理》、孙德谦的《汉书艺文志举例》、顾实的《汉书艺文志讲疏》、陈国庆的《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张舜徽的《汉书艺文志释例》和《汉书艺文志通释》，等等。其他的相关研究更多，就不用再说了。因之，据今而作《汉书·艺文志》研究要有自己的东西，实在不易。然读了海江博士是书，笔者眼睛却为之一亮。

《〈汉书·艺文志〉辑论》分为上、下两篇。前者为“论”，包括《论〈汉书·艺文志〉的编次》《〈汉书·艺文志〉图书的分类》《〈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汉书·艺文志〉“八体六技”刍议》及所附《〈汉艺文志考证〉版本研究》《〈汉艺文志考证〉的学术价值》等论文，探讨与辨析《汉书·艺文志》的相关问题。概言之，这些论文均有新意、有深度、见功力，而非泛泛之论所能比。此中，既有宏观的研讨如《论〈汉书·艺文志〉的编次》，其云：“《汉书·艺文志》反映了西汉时期的学术状态、学科地位，有着较为明显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价值判断；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虽然还不能说是当时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等人的自觉意识，但客观上已经初步起到了这样的效果。《汉书·艺文志》反映了‘六艺’之学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之所在，作为优势学科，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诸子之学在汉代有了新的变化，其中道家（表现

为黄老学说)和儒家先后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扶持,儒家更是后来居上,因此其地位仅次于‘六艺’。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不入《六艺略》,说明‘六艺’并非儒家之专利,而是华夏民族精神的共同财富,儒家对它进行建设与维护最为有力,其他诸家也无不受其影响,只是在扬弃的表现上有着差异。‘诗赋’为纯文学,和平时期较之‘兵书’更适应时代的需求,后者作为武备故退居于《诗赋》之后。《数术》之学在刘、班等人来看已是小道,而《方技》可祛病养生亦自不可少,而其授受更具私密性,理当不为显学。《汉书·艺文志》编次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其中子目的分类上。”将“汉”还归“汉”而就《汉书·艺文志》以观《汉书·艺文志》,显而易见,是可谓“心知其意”而得其大者矣。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的“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之“不徒”云云,的然。而细读是文,并以之与其前和同时的相关论著比观,即知海江博士之论自有其至人之所未届者在焉。《〈汉书·艺文志〉图书的分类》一文同样如此,见灼而入深。亦有较为微观的探讨与辨析如《〈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与《〈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前者云:“《汉书·艺文志》中的赋类作品的分类与排序标准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其中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这既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同时也与《汉书·艺文志》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楚辞》一书断非选自《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另外,研究《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尤其是前者,对了解《楚辞》中的作品如东方朔《七谏》的来源与著录等方面的情况有所帮助。”后者云:“据王逸《楚辞章句》知刘向曾编《楚辞》一书,然而《汉书·艺文志》不收刘向所编之《楚辞》,其原因是刘向校书之时《别录》未录,刘歆因之不收,班固亦不‘入’。在当时的著述观念中,学术等级严明,编纂典籍与著述有别,刘向不以此为功。另外,《汉书·艺文志》既已著录‘屈原赋之属’,如果再收入《楚辞》则重复著录,自坏其体例。”是亦均甚有见地,可谓一篇是一篇者也。于此,不仅见出海江博士厚实的文献根底,亦体现出了

其良好的理论素养而知在“关键处”着力。

至于下篇的情况，其《凡例》有很好的说明。今观其具体的做法，便知海江博士此“辑”之所成，融注着其自家的心得，而经智慧之“提升”；所裁识高，为体得法。历史学家王尔敏（1927—）先生云：“我辈治史学方法，尤在罗列诸说，提供参考，并无法任择其一，迫使学者接受。故史字原意若何，仍当就多方参考之中，期待确诂的达成。”（《史学方法》第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氏是说，与太史公撰史之追求虽或有所异，然亦一良法也。海江博士之“辑”，实亦如是。“就多方参考之中，期待确诂的达成”，以余观之，海江博士所以为此，大有隐其“期待”读者之“确诂”焉。虽然，余有一惑：以海江博士所“辑”之得法，何以所引相关专书多不标明页码与卷数。对此，海江博士说：“记得往年在桂林随先生读书时，先生反复强调引文必用第一手文献，尽可能做到全面而准确。先生说过多位名家本来引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而标据严氏所标出处之误，刊物或专书不时出现引《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及《楚辞评论资料选》等一类书之文而不复核原典所致的种种问题等，故虽知标明页码与卷数方便于读者，然担心某些读者直接以此代替原原本本的第一手文献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故最终没有标明而仅附上引用书的版本。其实，由于有《汉书·艺文志》之‘文’作参照，在相关的原典上找出其具体的位置并不难。”海江博士还说：“‘论’的部分，原本想作一系统的理论探讨，即分章究孟坚何以于史书中设《艺文》一志，是志的编次与分类情况，是志对后代史志与私家书目的影响，历代对是志的研究，等等。不过，考虑到篇幅或过大，且日后拟另撰一专书研讨之，故作罢。”听罢其言，余默然久之。就前者言，其《凡例》云：“凡首引之文献与首创之论述皆详列之，而后来之复赘则概加删弃”，“各注家条目设置不一，今以《汉书·艺文志》为准，作适当分并”。由于“首创之论述”虽“皆详列”，然往往“作适当分并”，故比观此众家之说尽管多有助读者之思，读者却当就启“吾思”者之所出，结合其上下文而再酌之。问题是，正如周建忠先生20年前批评某些学人以《离骚纂义》所引之“文”代替其原典时说的：“近年来出现了一个不好的倾向：不查原著、不明《纂义》体例就凭借《纂义》作研究的还不少，有的

考据文章只有一条附注：“以上所引各说见《离骚纂义》。”（《当代楚辞著作评论综述》，《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而这一“不好倾向”，于今尤甚。……就后者言，其志远矣，可喜可贺，余企望焉。

想十年前，海江由湘负笈桂林从余游，其好学深思、敬师乐群、为人踏踏实实、为学踏踏实实，给余留下了十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与海江博士同时从余游之孙振田、杨亮二君，亦的的然品学兼优者也）。海江硕士毕业后，有幸考取著名学者——浙江大学崔富章教授——的博士生，在崔先生的点拨下，学业大有长进。《〈汉书·艺文志〉辑论》即由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成，今其即将付梓，而海江博士嘱为之序，故拉杂而为此。是为序。

力 之

辛卯岁仲秋写于桂林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属于传统历史学的范畴。它历来学术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治学的门径，而杨和康教授，位列南京首座。有关《汉书·艺文志》的研究研究不断，自宋代《汉艺文志考索》问世之后，《汉书·艺文志》成为专门之学。此后越来越有重视，晚清民国两代更是蔚成显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大学还专门开设《汉书·艺文志》课程。相关研究成果也颇著丰富，如宋代的郑樵、明代的胡应麟、焦竑，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章学诚、姚鼐、朱一新、王先谦，近现代的顾颉刚、孙德源、余嘉锡、姚名达、钱宾四、陈直、王重刊、顾绍洪、陈槃庆、张其成等，都有精深的论述。然而这些传统分散各处，目前虽有陈国治的《汉书艺文志注释与辑校》和《〈汉书艺文志〉注疏》中附《艺文志集注》，然而总使人有挂漏而不能大嚼之憾。在广西师范大学肇庆与浙江大学古籍整理期间，我的

序 三

前辈学者早已认识到了目录学的重要性，唐代毋斐说读书而无目录学，就如“衔石填溟，倚杖追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也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汉书·艺文志》是目录学上的重要著作，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很高，历代学者十分重视，将其视为治学之阶梯和学海之津筏。王鸣盛还引金榜语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读书需有门径”条中也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他在《书目答问·略例》中也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大戴礼记·小辩》中说：“夫道不简则不行，不行则不乐。”余嘉锡曾说：“故学者必有守约施博，执简御繁之道。”他还说：“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可见，目录学就是那“执简御繁之道”，学好《汉书·艺文志》可以高屋建瓴，能够掌握以简御繁之道。可以说《汉书·艺文志》是进入传统学术殿堂的正门，由此门而入者，其身尊，其品高，古今凡成大学问者，莫不由此门而入。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属于传统历史学的范畴。在目录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喻为治学的门径、阶梯和津筏，受到高度重视。有关《汉书·艺文志》的研究历代不绝，自宋代《汉艺文志考证》出世之后，《汉书·艺文志》成为专门之学，此后越来越受重视，晚清民国间更是成为显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大学还专门开设“汉书·艺文志”课程。相关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如宋代的郑樵，明代的胡应麟、焦竑，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章学诚、姚振宗、朱一新、王先谦，近现代的顾实、孙德谦、余嘉锡、姚名达、杜定友、陈直、王重民、杨树达、陈国庆、张舜徽等，都有精深的论述。然而这些论述分散各处，目前虽有陈国庆的《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施之勉的《汉书集注》中的《艺文志集注》，然而总使人有过庖厨而不能大嚼之憾。在广西师范大学读硕与浙江大学古籍所读博期间，我的

导师力之（刘汉忠）教授和崔富章教授十分支持我从事这项研究，并给予大力的支持与认真的指导。

拙著是在本人博士学位论文《〈汉书·艺文志〉研究——以〈六艺略〉为中心》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六艺略》是《汉书·艺文志》中最核心的部分，在古代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书全面搜集《汉书》问世一千九百余年以来，历代学者有关《六艺略》的各种注释和论说，再进行文献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专题研究。

本书分论稿和辑注两个部分，在资料收集和学理考辨方面都有所推进。此前虽有陈国庆的《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和施之勉《汉书集注》中的《艺文志集注》，然而前者由于编撰时间较早，资料收集不够全面，虽然已经备受学者们重视，但似乎还不能满足需要；后者虽然资料有所增加，考辨有所深入，但因为只是《汉书集注》中的一个部分，其中《艺文志》部分还可以做得更深入。拙著以《六艺略》为中心，在资料收集和考辨上有进一步加强。其中收集的材料十分丰富，编排体例科学，对前人的疏漏多所补苴，所作按语，亦能推陈出新。论稿部分对《汉书·艺文志》编纂体例的论述受到学界关注，已有多位学者引用。这一成果能较好地解决楚辞学、辞赋学上的一些难题，如《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问题，《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等问题。对《汉艺文志考证》的研究，发现北大藏元刊明修本早于元大德刊本，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并指出北大藏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大化书局影印本都存在错简、残缺问题等。在梳理前贤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归纳出几个方面的疏失，也言之成理，例如，《诸子略》“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条，杨树达引姚振宗说“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则旧有《新语》之书，省其复重，别编为《新序》”，然而据《晋书·陆喜传》原文，省、咏、感、观、览、读，为连言，则“省”字为“观省”之意，而非省其重复之“省略”。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辑注中亦时有发现。

拙著力求在科学性、创新性和实用性方面取得突破。作者本着求实创新的原则，将立论建立在较充实的文献根据上，不作架空之言。某些论点有创新价值，已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辑注部分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并且有所考辨，将为学术研究提供实用的资料。

由于本人的能力和水平有限，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部分，这虽然是《汉书·艺文志》的核心部分，但还有不少方面需要后继开展。另外，对有些专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甚至可能存在观点偏差，还有待专家指导和本人更进一步的学习与思考。

上篇 论 纲

《汉书·艺文志》的编次	1
《汉书·艺文志》图书的分类	11
《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	11
——兼考《楚辞》章句及“惠厚赋之属”	24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33
《汉书·艺文志》“六经六技”论议	41
论西汉经学之隆兴	49
——兼论汉儒、章句家与训诂	57
——兼考周勃世家与诸子关系论断	57
《汉艺文志考证》版本研究	63
《汉艺文志考证》的学术价值	70
“目录学”刍议	84

下篇 考 注

凡 例	94
《汉书·艺文志》总叙	96
《易》类	112
《书》类	139
《诗》类	174
《礼》类	203
《乐》类	239

目 录

上篇 论 稿

论《汉书·艺文志》的编次	1
《汉书·艺文志》图书的分类	11
《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	
——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	24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33
《汉书·艺文志》“八体六技”刍议	41
论前汉儒学之隆兴	49
一致而百虑 殊途而同归	
——先秦两汉经学与诸子关系论析	57
《汉艺文志考证》版本研究	63
《汉艺文志考证》的学术价值	70
“目录学”商兑	84

下篇 辑 注

凡 例	94
《汉书·艺文志》总叙	96
《易》类	112
《书》类	139
《诗》类	174
《礼》类	203
《乐》类	239

《春秋》类	253
《论语》类	307
《孝经》类	329
《小学》类	355
《六艺略》大序	396
主要参考文献	403
后 记	406

上篇 论 稿

论《汉书·艺文志》的编次

摘要：《汉书·艺文志》反映了西汉时期的学术状态、学科地位，有着较为明显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价值判断；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虽然还不能说是当时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等人的自觉意识，但客观上已经初步起到了这样的效果。《汉书·艺文志》反映了“六艺”之学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之所在，作为优势学科，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诸子之学在汉代有了新的变化，其中道家（表现为黄老学说）和儒家先后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扶持，儒家更是后来居上，因此其地位仅次于“六艺”。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不入《六艺略》，说明“六艺”并非儒家之专利，而是华夏民族精神的共同财富，儒家对它进行建设与维护最为有力，其他诸家也无不受其影响，只是在扬弃的表现上有着差异。“诗赋”为纯文学，和平时期较之“兵书”更适应时代的需求，后者作为武备故退居于《诗赋》之后。《数术》之学在刘、班等人来看已是小道，而《方技》可祛病养生亦自不可少，而其授受更具私密性，理当不为显学。《汉书·艺文志》编次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其中子目的分类上。

中国目录学从“薄次甲乙”“记录图籍”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应当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汉代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产生，标志着这个进程的重大推进。后来的《隋书·经籍志》（书中或作《隋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学著作继承并发扬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优良传统，因而它们都成为学者的鸿宝，治学的津筏。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再到《四库全书总目》等，它们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共同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序和小序阐明其学术的价值和学科的特征，一是通过对典

籍的分类和排序反映学科种类和学术渊源。

《汉书·艺文志》的体例，在对图书的分类和排序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学术状况，体现了刘氏父子与班固等人的学术价值判断。《汉书·艺文志》（书中或作《汉志》）直接承刘向《别录》、刘歆《七略》而来，数典不能忘祖，因此论《汉书·艺文志》必然要涉及刘向、刘歆父子。章学诚说：“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①刘向、刘歆父子“深明道术精微”，故能通过“部次条别”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班固《汉书·艺文志》分图书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这样划分是否源自刘向尚不可考，但据考证，刘歆《七略》是《六略》加《辑略》而为“七”，今班固《艺文志》中大小序录之言即《辑略》之文，若此言不诬，则班固分图书为六类，当本自刘歆。《汉志》总序即按此《六略》顺序叙述，而《汉志》图书亦按此顺序分类排列，如此“部次条别”，正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揆之以理，如此排序，也有其客观必然性。首先，《六艺》是显学，且源远流长，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诸子》为《六艺》的支裔，自然不能与《六艺》比肩而立。余嘉锡说：“汉人经术之盛，因其能发策决科，而诸子不立博士，故其学日以益微。”^②所谓“发策决科”就如同制定政策，判决案卷。汉代虽另有刑律，然而其学术地位没有六经的高，汉人制定政策、判决狱案往往要从六经中寻找根据，诸子之学哪能有如此高的学术地位，至于“诸子不立博士，故其学日以益微”，却还得进一步分析，因为诸子不立博士乃是武帝以后之事，而武帝之前“博士决不限于五经传记”^③，据钱穆先生考证，文、景两朝立有诸子博士，如鲁人公孙臣，以言“五德终始”召拜为博士；贾谊年二十余，以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亦召为博士；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文帝时亦为博士。而诸子此时，“其学益微”，当是武帝以后的事实。余嘉锡又说：“（诸子）幸而得传者，端赖文章之奇伟”。^④此说亦深中肯綮，

①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45页。

②、④ 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114页。

③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4页。